

編言

眾所皆知，伊斯蘭自西元七世紀興起於阿拉伯半島之後，隨著時間的推展，至今已傳遍世界各地，成為世界性宗教，信仰者(穆斯林)人口約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所謂的「伊斯蘭世界」，西起西非，東至中國西北之新疆維吾爾斯坦(Uyghurstan)，此一空間存在許多不同民族之穆斯林社群(Ummah)。隨著對外的傳播，伊斯蘭文化由初期的單一性(阿拉伯式)逐漸發展成多元性的世界文化。如同其他世界宗教，伊斯蘭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具差異性之在地特色，表現於不同的地方文化、歷史、政治、地理情境中。因此，在研究伊斯蘭文化或歷史發展時必須考量其所具之地域性，詮釋之。伊斯蘭在地化(localization)為伊斯蘭研究(Islamic Studies)中的一個重要主題。人類學家常常將遠離伊斯蘭中土地區(central lands of Islam)的伊斯蘭視為「邊緣伊斯蘭」(peripheral Islam)，如中國地區(the Middle Kingdom)或黑色非洲的伊斯蘭。

在中國地區，伊斯蘭傳統所呈現的面貌、教義之實踐皆有別於其他地區，吾人若比較中國與印尼地區之伊斯蘭傳統即可得知。不同地區的伊斯蘭文化傳統「大同小異」，而「小異」即是「在地化」之現象。本主題書所收集的文章中，祁學義的論文即提出了伊斯蘭文化的多元性，其觀點說明了伊斯蘭發展在地化之必然性，為其他探討中國伊斯蘭文化的文章作了基礎說明。

伊斯蘭傳入中國地區，其途徑、時間眾說紛紜。比較確切的途徑應是透過商賈、蘇非傳道士；而穆斯林社群的建立應是蒙古人征服中國地區之後。之前，蒙古人早已橫掃伊斯蘭中土，滅掉阿巴斯

朝(the 'Abbasids, 750-1258 AD)，其部分後裔留居該地，建立了伊斯蘭化的伊兒汗國(the Il-Khanids, 1256-1353 AD)。因為蒙古人的征服伊斯蘭中土，大量的穆斯林被編入軍隊，隨著蒙古征服者進入中國地區，在滅掉宋朝後遂定居於蒙元帝國內，逐漸形成穆斯林少數社群，並也導致其宗教傳統在地化(穆斯林社群生活之漢化)的發展，這種活動乃隨著蒙古征服者在中國的漢化進行之。換言之，穆斯林的「漢化」過程發展出所謂的「中國伊斯蘭」(Chinese Islam)，其傳統頗異於伊斯蘭中土。林長寬的文章對此歷史發展背景做了解析。

一般而言，伊斯蘭在地化的現象可分為內在與外在兩層面，即教義與儀式傳統。伊斯蘭文化與傳統的發展在西元七世紀其原初建立之時即有融合的現象，亦即融有中、近東地區宗教教義與傳統之元素；而伊斯蘭往外傳出阿拉伯半島後，在地化則是信仰、社群生活延續之道。有傳統學者主張，伊斯蘭教義無法在地化，但儀式或生活傳統則可，其原因不外是人種本就多元，獨一神所創造的地球亦呈現區域的多元性，因此人類的生活模式受到地理、社會環境的影響而有所不同；如就飲食傳統而言，每一地區的穆斯林社群皆有其自身特色，即使在中國地區，穆斯林的飲食傳統亦因民族性而有差異。

丁士仁的文章主張伊斯蘭的在地化只能行之於外在的生活面向，精神面的教義則無法改變，蓋教義在地化則會失去伊斯蘭信仰之核心價值。西方研究認為此觀點往往強調對原始教義的執著，進而產生「原教旨主義」(Salafism)之思想、態度，排斥非原初之教義發展。歷史上所謂「正統」與「異端」的衝突，即源於此；但這並不意味著「原教旨主義」之偏頗不當。通常，教義的在地化即是對在地原有的宗教教義、傳統妥協，甚至被超越，並將在地原生教義內化之。傳統的漢語穆斯林(回民)往往認為伊斯蘭的「忠真之道」與儒家「中庸之道」教義可以相融並存。丁俊的文章即為此觀點提出論證。然而，有一必須考量的基本點是伊斯蘭「真主獨一性」(Tawhid)的教義不當被忽視，因此在論證伊斯蘭教義與儒家思想是否有交集時，必須立基於此一教義基石。若依照丁士仁的觀點，丁俊所提出的論述當僅是「禮儀」傳統的在地化，或共同倫理道德觀的並存呈現，畢竟儒家的「天」是否等同於伊斯蘭所強調的宇宙唯一造物者「真主阿拉」(Allah)仍有待深入探討。

一般認為所謂的中華文化其本質乃儒、釋、道教義、價值觀的融合，此為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然而，楊文炯則主張中華文化的要素應涵蓋儒、釋、道、伊〔斯蘭〕。此觀點實為一創新，旨在強調伊斯蘭的宗教元素當可融入其他中國在地的文化思想中。伊斯蘭教義是否可完全融入「大中華民族」的文化中，且為非穆斯林所接受，實為大哉問。少數群體的穆斯林其在地化或漢化，並認同儒、釋、道文化中的要素，乃是社群生存，信仰延續之道，但是現代非穆斯林的多數群體是否能認同伊斯蘭教義、傳統，尤其是「偶像崇拜」的爭議問題，則有待進一步地觀察、探討。楊文炯的文章也很明確地以人類學的觀察，指出漢語穆斯林在地化的外在表象，如清真寺建築、裝飾之中國式廟宇表徵，此即呼應了丁士仁的觀點與理論。

大多數學者主張明末清初所出現的穆斯林漢文典籍(Han Kitab)乃「以儒釋經」的現象，即以儒家觀點來解釋伊斯蘭教義。「以儒釋經」的觀念實有重新檢視之必要，因為漢文著作的產生未必是漢語穆斯林其宗教思想的儒化。漢文譯著運動若被視為在地化現象，則可能不符合「教義不可在地化」的論點。回溯穆斯林社群歷史，經過明朝一代急速漢化，大多數的漢語穆斯林(回民、穆民)對其宗教信仰、儀式已無所知，伊斯蘭文化的認同亦隨之消逝，其祖先所使用的「伊斯蘭語文」(即阿拉伯、波斯或突厥語文)已被漢文所取代，即使日常生活禮拜儀式的使用阿拉伯語、波斯語，亦不知其意義。穆斯林社群過度的漢化造成「信仰危機」，方產生復興思潮；而且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已無法作為生活文化的載體，漢文不得不作為推動宗教復興的工具，故造成漢文譯著的產生。因此漢文典籍的出現乃「伊斯蘭復興」的現象，亦是漢語穆斯林社群「生存救亡」之道。這也是少數群體對主流文化必然的妥協。

一般而言，伊斯蘭知識、傳統的延續主要透過Madrasah(經學院)的教育制度。即使元代穆斯林的社會地位相當高，穆斯林大量移入中國後似乎並沒有建立完整的伊斯蘭教育體制，這導致境外移入的穆斯林對伊斯蘭知識與傳統根源無法掌握，甚至與中土伊斯蘭切斷關係。一直到明代才有所謂的Madrasah的產生，但其規模並不如伊斯蘭中土。沙宗平的文章指出胡登洲的創立「經堂」，提倡伊斯蘭教育乃在地化現象之一，其主要原因是教學語言(小經、小兒錦)與

教材的使用問題。無可否認，伊斯蘭世界各地Madrasah教育所使用的語言並無統一性，但阿拉伯文則為共通之宗教語言，不同語言的使用於經學院教育，此為伊斯蘭於地方情境之發展結果。就歷史發展觀之，中國穆斯林的經堂教育至今並未發展如伊斯蘭中土的全然體制，以建構宗教學者（‘Ulama’）的獨立制度。此乃值得深入研究。

中國的現代化引發了都市、城鄉的變遷，舊社區的結構往往遭到都市更新計劃的影響而改變；相對地，穆斯林社群亦受到波及。哈光甜的文章清楚地點出作為穆斯林信仰活動中心的清真寺其行政組織及周遭社區往往受到都市更新計劃影響，承受相當大的外來壓力而產生變化。此外，都市現代化的過程中亦牽引出現代穆斯林婦女的教育問題。馬強的調查報告說明了穆斯林婦女教育因城鄉都市化開始受到重視。這背後的原因當然與中國的開放經濟改革有關，並且也因伊斯蘭全球化的風潮，間接地引發清真女學或女寺的發展。伊斯蘭與婦女關係的性別研究已發展出全球性議題，此主題在研究現代中國伊斯蘭時應受到更大的關注。

目前有關現代中國伊斯蘭的研究比較常被西方學界注重的議題是「少數群體」問題。由於穆斯林的離散，非伊斯蘭世界出現相當多的穆斯林少數社群，特別是歐美地區。在中國，穆斯林似乎永遠是少數群體。非穆斯林學者余之聰的文章討論了宗教少數群體的觀念、問題。少數族群的發展與在地的政府政策有著密切關係，而且那些社群與伊斯蘭中土的宗教思潮亦有所關聯。以此看待中國地區，穆斯林少數群體的發展當可與其他地區之穆斯林社群做一適當比較，如余之聰文章之所議。探討穆斯林少數群體的宗教問題時，「國家認同」的因素亦必須納入考慮；而更重要的是，必須理解穆斯林少數群體如何在非伊斯蘭國家中實踐伊斯蘭律法(al-Shari‘ah)，以落實全然的「生活之道」(al-Din)。

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其穆斯林社群發展必須重新檢視。香港在地的穆斯林社群包含了華裔、印巴裔，這些人是否應被視為「中國穆斯林」或「少數民族」將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議題。Paul O’Connor的文章對香港在地穆斯林社群做一概括性的理解，並回顧了之前的相關研究。香港地區不同穆斯林族群關係之議題似乎尚未受到注重而有所著墨。印巴裔、華裔或其他族裔穆斯林其在香港社群之間關係發展將是香港伊斯蘭發展的一個重要觀察指標，這顯示香港伊斯蘭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間。

西方世界對中國伊斯蘭的理解當起自於歐洲的傳教士，明代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對當時穆斯林的漢化情況即有觀察。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歐美的基督教「中國內陸宣教會」(Inland China Mission)也積極地在研究中國的穆斯林，其目的地當是對穆斯林宣教做準備。何偉業的文章以 Mashall Broomhall 為例說明西方基督教世界對現代中國伊斯蘭的理解。而事實上，儘管未必受到穆斯林的認同，西方教會人士的研究當可提供中國穆斯林本身去理解其宗教文化的現代發展。隨著時勢的轉變，西方教會人士對非伊斯蘭世界穆斯林之研究已不再帶有強烈的宗教殖民色彩；相反地，它帶動了宗教、文化對話的契機。因為「伊斯蘭」與「恐怖主義」經常被不當地劃上等號，伊斯蘭遭到誤解與渲染，使得「宗教對話」的研究有其急需性。

過去幾年，香港中文大學的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以及人文學科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的「伊斯蘭研究計劃」(Islamic Studies Initiative) 與伊斯蘭文化協會(香港) (Islamic Cultural Association-Hong Kong) 合作舉辦了兩次有關「中國伊斯蘭」的研討會及相關學術活動，其中一些文章符合「伊斯蘭在地化」之議題則被編輯收入此主題書。論文作者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學者皆有。穆斯林學者的文章無疑地反映了 insider 對其自我宗教文化的理解與主張，這些穆斯林學者在現今漢語穆斯林社群、學術界皆有一席之地，其論述當有理解當代中國穆斯林思想的參考價值。而最可貴的是非穆斯林學者的 outsider 觀點亦提供穆斯林理性地看待自己的宗教文化，進而達到對話、交流之目的，以促進族群的融合與和平共處。

這些論文之所以能編成冊出版，首先必須感謝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所長熊秉真教授、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賴品超與譚偉倫兩位教授、歷史系的蒲慕州教授，他們的鼎力支持，以及伊斯蘭文化協會(香港)慷慨的經費贊助。其次要感謝「伊斯蘭研究計劃」前研究助理黃淑婷女士，以及現任的楊玉娜女士與包修平先生三位辛苦地聯絡諸位作者，協助文章的編輯、校對、封面設計等相關出版事務。最後並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製作部經理馬桂鴻先生對此書出版之肯定支持，陳素珊與梁寶玲小姐在編輯、排版上的專業指導。這是一本拋磚引玉的主題書。期望不久將來中文大學的伊斯蘭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之後，會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問世。